

中 · 华 · 文 · 史 · 资 · 料 · 精 · 华 · · 本

百年文史写真书系



近现代重大历史事件

漩涡沉浮

中国近现代重大历史事件

第一卷 民主革命



中国文史出版社

百年文史真书系

资料

中 · 华 · 文 · 史 · 资 · 料 · 精 · 华 · 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漩涡沉浮：亲历近现代重大历史事件/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1

ISBN 7-5034-1116-3

I 漩… II 全… III. ①中国 - 近代史 - 历史事件 -
通俗读物 ②中国 - 现代史 - 历史事件 - 通俗读物 IV
K250.5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83150 号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址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刷 北京市世界知识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 625 字数 302 千字
印数 3001—5000 册
版次 200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次 2001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
定价 18.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出版说明

20世纪去了，21世纪来了。过去的世纪需要回顾，需要温习，新来的世纪应当展望，应当奋进。回顾是为了更好地展望，温习是为了进一步奋进。为了回顾，回顾上一世纪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沧桑巨变；为了温习，温习上一世纪中国先贤们的奋斗历程，我们选编了这套《百年文史写真书系》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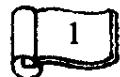
这套丛书共分8册。分别是《硝烟弹痕》、《漩涡沉浮》、《机诈权变》、《淘金旧梦》、《文坛档案》、《学林碎影》、《丹青风骨》、《慈父遗爱》。书中的所有文章均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和各种专辑史料中选出，这里有军事、政治、经济，有文化、科学、艺术，所有文章都是历史当事者和见证人的回忆。这些回忆具有“亲历、亲见、亲闻”的特点，构成了20世纪活的历史。

编 者

2001年1月

目 录

| | | |
|-----|------------------------------|------|
| 1 | “万岁”非正常死亡別有隐情 | 察存者 |
| 7 | 民国外交中一段鲜为人知的内争 | 叶景莘 |
| 16 | 一波三折、无疾而终的南北“弭兵会议” | 叶恭绰 |
| 53 | “大总统”上台下台皆关钱财 | 王 坦 |
| 65 | 冯玉祥北京政变：开局容易收局难 | 鹿钟麟等 |
| 91 | 末代皇帝被逐出宫的详情细节 | 溥 佳 |
| 121 | 三·一八：“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 楚溪春 |
| 125 | “小扇子军师”涂树铮被处决真相 | 吴锡祺 |
| 129 | 翻云覆雨：蒋介石崛起之初策划的一场阴谋 | 马文车 |
| 137 | 山雨欲来：四·一二政变前的秘密反共会议 | 黄绍竑 |
| 144 | 瞒天过海为反共 | 慕中岳 |



- 149 张大帅皇姑屯被炸事出有因 周大文
156 从宁粤合作到蒋汪合流，貌合心难合 陈铭枢
191 两起举国震惊的暗杀事件内幕 沈 醉
198 破译日本密电码的特殊经历 王维钧
231 从苦谏哭谏到兵谏 晏道刚
243 法庭的审判与历史的审判 陆 治
250 令人触目惊心的綦江惨案 刘 非
258 国军将领芷江受降中的拙劣表演 严怪愚
263 自作孽，不可活：周佛海的最后岁月 沈 醉
284 旧上海黄金风潮：一条黑线通到底 何汉文
302 偷梁换柱，杀害闻一多真凶逍遥法外 王凌云
305 “头可断，国大代表不能让” 赵遂初
310 李宗仁费尽心机竞选“不值钱”的副总统
..... 王捷三
318 1949 年国共北平和谈始末记 余湛邦

“万岁”非正常死亡别有隐情

寒 存 著

光绪死时我尚年少。其时父亲增崇在清廷内务府^①任三席大臣。叔父们（增德、增麟、增绂）也在府内任郎中、员外郎。

记得一天下午五点来钟，我父亲和我的两位叔父，还有我和两个叔伯哥哥在一起，正准备吃晚饭，内务府堂上来了一位送“知会”^②的“官人”，说：“万岁爷病重，请堂官即刻进里头预备差使。”这话由我们家管事的张俊峰入里院转告了我父亲。当时老兄弟三人一听完这口传“知会”，俱现出难以置信而且惊疑异常的神色。

父亲问张俊峰：“你认识这个送知会的人吗？”张俊峰回答说，他一听这话也很诧异，所以对送知会的人盘问了许久。听送知会的人说话不像有什么差错的样子，他才敢来向主人送话。

父亲和两位叔叔面面相觑了许久，只听父亲连声说“不对”，两位叔父也同声说：“这是怎么回事？”父亲说：“就是不对。前天，天子受次席总管内务大臣继禄所带的大夫请脉，没听说有什么事。”我那两个

① 内务府：清代总管皇宫事务的机构，掌管宫廷内的祭礼、财务、警卫、刑狱等事务。

② “知会”：通知。

叔父也说：“上头欠安，若是重的话，还不‘发抄’^①吗？”

父亲同几位叔父向来不以为皇上有什么大病。记得戊戌政变后，八国联军侵华之前，父亲还在南京任江南织造时，叔父增德、增麟、增绂三人给我父亲写家信，说他们与宫内深交的太医谈及“皇上无病，所进的药也不吃”。^②信中还说“奉旨病源许添不许撤”；^③我的姑丈，内府堂笔帖式英绅（字书卿）也曾写信给我父亲，说：“懿旨每日著总管内务府大臣一员，带领请脉。拟方后赏饭吃”，^④姑丈与府内十余人“轮流帮同照料”，^⑤医士“终日不得闲”。^⑥他在致我父亲的信中说：“脉案一纸，奉阅可也。据医士云，此症不甚重，无非虚不受补之意。其脉案上话语，系春季所有的病症，均奉旨不准撤，全叫写上。其实病症不是那样，要是那样，人就不能动了……”父亲不仅保存了所有这些家信，并将他们抄录来的光绪脉案、药方都收藏好了。此外，我还见父亲保存的“再启者”残信，已无正文和署名，信的语气似是太医报告当时宫内情形，言及外省保荐医士四人进宫为光绪请脉（山西朱焜、江苏陈秉钧、两广卢秉政、门定鳌）。其中有的被上头斥为“脉理欠通，用药固滞”，打发回去；有的未过多久声称“家母有病”，告假回去了。余下的一人谨小慎微，一人迹近钻营。父亲保留的此残信中云：“圣躬各症……仍属先天不足，后天失养云云。然以仆观之，大局无妨，不过一时难复元耳。草此达知，外人不足道也。”我还记得抄文中言皇上“鼻塞声重，少流清涕，喉间发涩，项筋作痛；呛咳无痰……两肩坠痛，耳仍作鸣；身体倦懒，腰间作疼；心烦口渴”等等，从当时所获的光绪脉案和病情看，不过如此而已。

我父亲和叔父们因在内务府供职，与医士们来往较多，我曾听到他

① “发抄”：正式抄录药方及脉案，通报各处。

②③④⑤⑥ 见《关于脉案的书信说明》

们和亲友讲过这么一段故事：

有位初学当差的太医，在西太后前对答光绪脉案时未曾留心，说了句“舒肝顺气”。西太后把脸一沉，说：“谁叫皇帝的肝不舒了？气儿又怎么不顺了？”吓得那位太医连连叩首认罪，忙不迭地说：“奴才初学当差，不会说话，请老祖宗开恩。”有顷，太后又转变脸色，对那太医说：“皇帝日理万机，宵宿勤劳，哪能动不动就得‘舒肝顺气’？那样小心眼儿怎么办国事？偶而小有违和，也不过是‘调、和、理、益’。”那位太医经此一吓，再也不敢应承请脉的差使了。后来为光绪请脉，处方总是“和肝调气”、“理肺益元”，甚至把“肝”的事硬挪到“肺”上去，成了“肺气清而肝自畅”，“脾胃健而气自充”等等。类似的例子很多，不一而足。

从当时的情况看，无论太医或外省保荐的医士，给光绪请脉都得依慈禧的脸色行事。凡干不长久的，多半是违背了慈禧心意；干长了的，则是切合了慈禧的需要了。至于世人所能见到的光绪的脉案、处方究竟如何，不待言说。对于这些事，我父亲、叔父们心中有数，我听得多了，也有些明白。

故此，乍一听皇上病重，全家呆若木鸡。我在一旁，只见老兄弟三人似是怀疑有人捏造谣言。张俊峰不愧是久经“跟官”的，对官场内幕很有经验，规规矩矩地站在一旁，一动也不动，口称：“这个事情倒是请三位老爷要慎重……”我父亲问：“你没见他从哪儿来吗？”张答：“倒也问过了，送知会的人说，咱们宅是头一家。从这儿再到沙井胡同给奎大人（奎俊，首席内务府大臣）送信，然后到马大人胡同景大人（景丰，末席内务府大臣）宅，继大人（继禄，次席内务府大臣）宅，西城麻花胡同，是由别人去送知会的。”我的一位叔父说：“二哥（指我父亲），您先给奎宅打个电话问问，怎么样？”我父亲想了想，“也好吧，就先问问，然后再看光景说话。”

于是这老兄弟三人一同去打电话，晚饭也停住不吃了。我们三个叔伯小兄弟愣头愣脑地跟在后头，要“旁听”个水落石出。那天晚饭正好有初冬当令的“锅子料熬白菜”^① 美食一大海碗，我们小兄弟仨“票了”^②，因为要替他们老兄弟们暂时保留起来，我们是吃不成了。

等到奎家的电话接通，果然送知会的人将离去，所言真与我们听得的一般无二。

我父亲和奎俊商议定了：仍穿常服进内，备带素服，用时再换。一面由我两位叔父分头再到别的人家打听，一人去找某一个太监，一人去找和宫内消息灵通的某司员，再作一番切实的打听，然后聚到奎家见面，计议如何进内。

于是老兄弟三人备车马，分头而去。我们小兄弟三人只吃了那照例的两盘两碗的晚饭。等到约近十点半的时候，他们老兄弟回来，再去吃晚饭。我们小兄弟三人又去旁听。此时只看见他们脸上露出一些不安的神色，而没有什么疑神疑鬼的样子。我那两位叔父对我父亲说：“二哥，您上去之后，事情怎么样了？”我父亲对他们说：“还说哪，我们四个内务府大臣上去之后，太监们说：‘大人们的差使我们都替当了。请大人上去看看吧。’我们上去一看，已经停放好了，当晚没事了。太监说：‘大人们请回宅歇息歇息吧，明天一早上来听旨（西太后的‘懿旨’），恭办大事吧。’我们就下来了。”

所谓“停放”，是宫中讳言，即棺木已经放在“中堂”，也可说是“停上”。言者隐约其辞，听者不便深问。据我当时的领会，“停上”是穿戴好衣冠，停放在灵床上，头东足西，尚未入棺木；若是已入棺木，搁置中堂，也叫“停放”或“停上”，那样外臣是看不见尸体形象的。

① “锅子料”：初冬烤猪肉与大肉丸子，合装火锅食用，称为“锅子料”。

② “票了”：喻无所得。

我当时不明白父亲说的“停放”指的是哪种，叔父们俱不言语，谁知他们又是怎样领会的？

我一位叔父说：“可怎么把上头‘请’过来的哪？（指把光绪的尸身从瀛台接到宫廷内）也没传‘万年吉祥轿’呀！”平时在乾清宫西面月华门“门罩”（即门道）下陈设着一顶轿子，名称是“万年吉祥轿”。如遇皇帝死了，无论是在什么场所，就用那乘轿子抬出来。据闻系自雍正以后才设置的。我父亲说：“那谁知道啊？人家不是说都‘替’我们‘当’了吗？那还不是他们想怎么‘请’就怎么‘请’。”我父亲又说：“前天继子受命（他有管理太医院事务的职分）带大夫请脉后，他下来说明带大夫的时候，上头还在外屋站着呢，不过脸上较平日灰白一些，还对他说：‘别的不舒服倒还没有什么，就觉得痰盛，叫大夫想法子去去痰。’只隔了一天！可怎么这么快呢？”一位叔父说：“这简直可怕啦！”另一位叔父说：“这里头有什么事儿吧？”我父亲叹了一口气，又摇摇头说：“这话咱们可说不清啦。”我们三个小兄弟就旁听到这里。

总之，光绪身故后，便是销声匿迹地移入宫中，不但没用“万年吉祥轿”“请”，甚至入殓之际究竟是怎样，也无人能知其详。就连在内务府供职的父亲、叔父们都讳莫如深，避而不谈。

此后无论是内务府的司官，或是外部的司官，我三位婶母娘家的兄弟侄们以及别的亲友，没有一个见面不说奇怪的。

我记得很清楚，过了没有一星期，这一类的话便倏然而止了。再听到的便是怎么办丧事，怎样走差使，所有的人再没有一个提光绪突然身故的话了。

过了“百日”后，从宫中发给具有得到所谓“颁赏遗念”资格的王公、大臣、懿亲、勋旧一批纪念物品，照例总是“吉服冠”一顶，“龙褂”一件，“吉服袍”一件，再搭上玉佩一类的一两件。我父亲所得“遗念”中有一件酱色宁绸面的两截羊皮袍子，在我看来，就非常奇怪：

漩 涡 沉 浮

上半截是小紧毛的羊皮，下半截是黑山羊皮，非紫羔皮。若照封建时代的实况来讲，这种两截皮袍根本不该是一个封建皇帝所用的，皮上身是小紧毛，御寒还不如一件厚棉袄。事后听许多人讲，凡是这一个等级的，得到的皮袍俱是如此，还硬要说“德宗”生平最喜好穿两截皮衣。后来听说光绪所住的屋子，冬天并不暖和，而且在光绪亲祭“坛庙”的时候，谁都看见光绪的鼻子下头总是挂着两条清鼻涕，他并不擦拭。“清鼻涕”与“小紧毛”当是有关联的了。

除了穿不暖，就是吃不饱了。在封建社会里，吃得多就得被说成是“胆大而多嘴了”。据太监们说，光绪吃饭，只有摆在眼前的几样菜食是新做出的，其余的俱和祭祀上供一样。初一搭上“膳桌”的菜食，可能到十五还是这些，所以光绪一吃饭就闹气。

再说到他的独身生活，更是凄惨。我的一位叔父（增级，内务府员外郎）常在带“匠”（给光绪的住所换纱窗的裱匠和木匠）的时候，到太监的屋里休息，常常听到他们说点闲话。有一次，我那位叔父向一个太监说：“咱们‘老爷子’（光绪）总这样一个人，他寂寞不寂寞呀？”那个太监说：“别提啦。我们‘上夜’（夜间在光绪住的房里守更）的时候，有时就听见老爷子叫‘小珍儿，小珍儿’的，还有什么‘小宝贝儿’……”那个太监说着，脸上也很凄惨。

关于光绪突然身故，还有一说。说是西太后曾经说过：“谁要叫我不能称心，我就叫他一辈子不能称心。”这本是在戊戌以后尽人皆知的话。另一句话就是西太后说：“我绝不能死在他（光绪）前头。”这句话在几个王府内都传说过。后来西太后自知病将不起，又正好赶上光绪多多少少像有点病，便叫李莲英给光绪送了药去，叫他看着光绪吃了再回去。光绪在吃药的当天下午就死了。

民国外交中一段鲜为人知的内争

叶 景 菁

外交委员会的产生和结束

北洋政府时期有过三个外交委员会：第一个是巴黎和会将开时于1918年12月中旬成立的，设于徐世昌总统府里。这个会因为反对签凡尔赛和约而于1919年5月3日自行结束。第二个大约是在1923年初黎元洪任张绍曾组阁时设立的，委员长为黄郛，我是委员。但这个委员会并未开过会，我不知会址何在，会的存在时期亦很短。第三个大约是在1925年段祺瑞执政时或较早些时设立的，委员长为汪大燮。他的惟一任务是邀集几个通晓国际法和熟悉条约的委员编一部不平等条约类编，将不平等的条件分类编列，以供修改不平等条约时参考。这是他的宿愿。类编印出后，会即结束。我未参加这个委员会。

现在我要叙述的是第一个外交委员会的事情。1918年10月徐世昌就任总统，11月11日日欧战停止，12月1日外交部总长陆征祥出国赴巴黎和会。他先到日本与日首相商谈，离日上船时就发现丢了一个公事

箱。国内舆论本认为陆非外交人才，且为签订《民四条约》者^①，颇为不满。陆出国后，外交次长陈箓代行部务。他资历甚浅，声望不高，一般人都认为不足以应付局势。于是梁启超、林长民二人向徐世昌建议在总统府设一个外交委员会，任外交元老汪大燮为委员长。徐采纳了，并以孙宝琦、熊希龄、陆宗舆、李盛铎、林长民、王宠惠、沈瑞麟、陈箓为委员，林长民兼事务长，我是管秘书事务的事务员。徐世昌原是个极圆滑的老官僚，他虽被段祺瑞拥上台而自己并无实力，所以要拉拢各党派以增加他的势力。那时他已聘林长民为他的顾问。林劝他请梁启超赴欧洲游历，与各国著名人士联络，为中国游说，徐也采纳了。这个外交委员会设在紫光阁西南角旁边的几间小房子里，虽在总统府内，但与府的办公处隔离较远。除汪、林二人及事务员们每日到会外，委员常来并对会务关心的只有熊希龄一人，王宠惠亦有时来，其他委员来开会时都采取敷衍的态度。当时我天真地以为对和会的政策都是由委员会决定的，专使来电都是由外交部送委员会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重要的来电确是抄送给委员会看的，但未必是全部。

外交委员会成立后，汪、熊二人即联合提出对巴黎和会的提案。共五大纲，首列破除势力范围，分目为收回租借地和铁路附属地、统一管理铁路、撤销外国邮电机关。其他大纲为取消领事裁判权、关税自主、撤退外国军队、停付庚子赔款。梁启超出国前，亦来会与汪、熊、林、王等讨论了这个提案，以便在外接洽。提案经委员会开会议论审查，于1919年1月6日一致决议通过，由汪、林二人亲呈徐世昌，奉命交院发。

① 1915年1月18日，日本政府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5月7日午后3时，日本政府向中国提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内答复对二十一条究竟是否承认。9日，外交总长陆征祥奉袁世凯命照会日使馆，对最后通牒要求各节概予承认。25日，陆征祥与日本全权代表日置益签订《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和《关于山东省之条约》，承认日本关于确定在南满与东蒙之权益和继承德国在山东之切权益的要求。

次日由林长民亲交代总理钱能训，于 8 日电致各专使，正在陆征祥抵法之日。18 日和会开幕。但以后我们才知道国务院电专使只将这个提案作为希望条件。^①

另有一事徐却完全接受了委员会的提议：陆征祥赴法途中与广州政府所派代表王正廷相遇，到法后陆即来电报告代表五人及名次，为陆、王、驻美公使施肇基、驻英公使顾维钧、驻荷公使魏宸组。汪看了这个名次甚为踌躇，因为和会只给中国三个席位，如五人轮流出席，怕有时对于和会情形有不接洽处；如由 3 人出席，则应为前 3 人，但陆无甚能力，王亦尚无外交经验，且对和会须南北一致，不知他的主张究竟如何，施则为怕多事的官僚，向不活动，这 3 人恐不足以应付局势。汪、林相商不决，我建议只好把顾提升到第二位，使他当冲。因为顾来电最多，与美国代表方面的接洽报告都是他这个驻英公使打来的，施并无一电；且二十一条交涉后顾所写的英文声明书颇为得体，他亦熟悉那个交涉的经过。汪采纳了，即将名次照改，与林同去请徐核定。徐同意了。汪、林回会，通知陈箓到会将新名单交他电发。陈拿这个名单出门时，低声说：“这是要捣乱了。”果然，新名单到专使处，王、施大哗，陆窘极。他到瑞士去躲避，此事即为一原因。但以后在和会上为中国辩论，确以顾为最力，并最能说。

委员会所提“破除势力范围”大纲里“统一铁路管理”一项引起了大争论。提案原文为：

^① 据刘彦著《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说，外交委员会所拟提案虽经政府于 1 月 8 日致电陆征祥令其照办，然被日本探悉提案有铁路统一案，千方百计图谋设法由中国人自动取消。不久，果有交通部总长曹汝霖、铁路协会梁士诒等忽然积极反对铁路统一案。后竟由国务院再致陆征祥，令其勿庸提出该项。陆征祥等遂依国务院前后训令，仅作成我国提出和会之希望条件，并将外交委员会所拟提案中铁路统一项删除（见该书下卷页 169—170）。

丙、凡以外资外债建造已成未成、或已订合同而尚未开工之各铁路概统一之，其资本及债务合为一总债，以各路为共同抵押品，由中国政府延用外国专门家辅助中国人员经理之，俟中国还清该总债之日为止。各路行政及运输事宜仍须遵守中国法律，概由交通部指挥之。

这个提案的主要目标原是为收回以外资建筑、为势力范围骨干的东清、南满、安奉、胶济、滇越各路。因为国家无此实力，故欲统一管理之，又因无赎回之财力，故欲将其资本及债务合为一总债而以铁路收入还清。但以外债建筑的如津浦、沪杭、京汉等各路亦与势力范围有关，如不包括于统一管理之内一律待遇，既不易得据有以外资建筑各路的各国同意，且恐收入不足以早日偿清总债而亦难于举一总债，因此欲将外资、外债建造各路一概统一之。

外交委员会提案于1月8日电各专使。约一个月后，因中国代表在巴黎要发表包括西原借款合同的中日秘密协定，日使小幡于2月2日到外交部抗议，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登出反对铁路统一的社论。而交通总长曹汝霖声明对于统一铁路案尚待研究，外交委员会委员陆宗舆亦称彼在会本不赞成。先是，称为旧交通系领袖的梁士诒已有反对统一铁路的言论，至是乃与称为新交通系领袖的曹汝霖一齐反对，认为统一即是共管。那时交通部顾问贝克和中英公司经理梅尔思各拟有“万国铁路团”私案，是共管性质，反对者即以此种拟案与外交委员会提案并论。

2月18日钱能训约赞否两方集会于春藕斋。汪、熊声明提案与贝克、梅尔思拟案无关，最后梁亦表示赞成之意。钱声明双方无根本不同之意见，办法应再详议。汪推曹、梁拟案。3月7日国务院召集春藕斋第二次会议，曹、梁提出破坏原提案的草案，林长民因双方争持不下，拟了一个妥协办法。汪不同意，会后即辞职不复到外交委员会。

平心论之，委员会提案中所举借总债及延用外国专家辅助经理的条件，是因为当时实际情形不能避免，并非共管性质，但以后是否会流于共管，确应考虑。举总债时如何方可不受新银行团的压迫，更是问题。熊希龄以为此等皆系商订条件时所当注意，但政局多变，商订条件者为谁，亦难保证。另一方面，破除势力范围单靠要求，无此实力；但不破除则势将引入瓜分，提案人认为这是最重要的理由。要之，原提案人的用意在破除势力范围，并非为私，他们提出由交通部指挥，而当时他们在交通界并无一个立足之点。梁士诒提出已成外债各路不在统一计划之内，有保持他由于管理和调运铁路收入而来的“财神”头衔之嫌疑。曹汝霖在《顺天时报》反对后出场，陆宗舆在第一次春藕斋会议时，竟为高徐、济顺两路辩护是商业性质而非政治性质，则简直是与日本“一鼻孔出气”了。这是赞否两方主要不同之点。徐、钱则以圆滑手段依违两可于其间，而终偏向亲日派。曹、陆被称为亲日派，汪、熊、林等则被称为亲英美派。

亲英美派是一班无拳无勇的知识分子，在国力太弱时，过分寄望于和会，尤其是对于威尔逊的和平条件十四条，以为公理或可战胜强权而欲借他人之力来保持自己的国土，这只能说可怜。但外交战术本当利用形势和对方间的矛盾。在欧战中，英无力东顾，日本已几乎大嚼“狮子”的一份肥肉，战后美国在海军方面又与英并驾齐驱，纽约还要夺取伦敦的世界金融中心。以势力平衡为传统外交政策的英国，本已利用后来的美国所提出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口号，以保持他所夺取的中国利权，战后他更得以“血浓于水”的甜言，利用日美间的矛盾以联美抗日。所以英美方面对于外交委员会所提破除势力范围一项，曾由两国公使表示赞成。美使芮恩施、英使朱尔典都曾宴请争论铁路统一政策的当事人而于宴后畅谈这个问题，并都声明贝克与梅尔思的私案与使署无关，他们二人亦不能向和会提出。与美使会谈时，汪大燮提出三点：